

首页

社会学动态

新闻消息  
公告启事  
学术沙龙  
升学留学  
招聘信息  
学生生活

社会学研究

推荐阅读  
学术专题  
学界人物  
论文辑览  
书刊推介

社会学评论

佳作评介  
社会评论  
群学博客  
BB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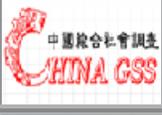
课堂内外

教学信息  
电子课堂  
课外辅导

电子资源

电子图书  
毕业论文  
调查数据  
网上调查

友情链接



社会学网站链接

大陆社会学人类

大陆学术网络资

大陆以外地区、

张昱 孙志丽 个体风险的社会管理

作者: 张昱 孙志丽 发布时间: 2011-07-14 信息来源: 社会学视野网

## 个体风险的社会管理

张昱 孙志丽

本文发表于《江海学刊》2011年第3期

内容提要: 中国社会转型既包括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也包括由现代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 这就使得中国社会既面临着传统社会的危险, 也面临着现代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风险。同时, 还面临着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互动而带来的风险。其中, 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个体碎片化是中国社会结构性风险的基点。个体的碎片化不仅带来了个体风险认知和决定能力的弱化, 同时也使社会风险认知和决定能力弱化。

关键词 社会转型 个体风险 社会治理

自贝克等人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后, 风险社会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人们从不同的视角讨论了风险社会, 列举了当代社会出现的金融风险、环境风险、核风险等各种风险形式。综观相关研究, 可以发现, 研究者们对我国所面临风险的类型讨论较多, 而在风险社会形成机制方面的讨论则更多地沿用了贝克、吉登斯等国外学者的解释。但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在这样的差异性中, 中国社会风险的源头及其表现形式是怎样的, 其形成机理如何, 将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 转型社会的风险结构

尽管学者们在讨论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时从不同的视角对诸如政治转型、经济转型、人的转型等众多方面进行了研究, 但学者们更多关注的似乎是中国社会的经济转型, 也就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在更高的层面上, 人们往往将之归结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无疑是正确的, 而且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但如果把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纳入全球社会的发展之中思考, 我们会发现, 中国社会转型并不仅仅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已经开始了由现代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 而这一转型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开始出现全球一体化的趋势。这导致中国的社会转型面临极其复杂的全球背景, 从而呈现出多样化和结构化的特征, 即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现代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社会转型与全球化并存。这也使中国社会转型面临着极其重大的任务, 一方面, 要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另一方面, 还要实现由现代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另外, 在这一过程中还要同时适应世界全球化的趋势。

在如此复杂多样的结构性社会转型过程中, 中国社会风险也具有了多样化、复杂化、系统化及结构化的特征。

就传统社会而言, 风险主要源自于外部。在贝克看来, 风险概念最初可理解为冒险, 源自于洲际商船的航行。<sup>①</sup>而吉登斯则认为, 风险概念最初可能来自西班牙的航海术语, 意为危险或触礁, “看来最初是在两个背景下出现的: 它起源于探险家们前往前所未知的地区的时候, 还起源于早期重商主义资本家们的活动”<sup>②</sup>。尽管学者们对风险一词起源的认定存在着一些差异, 但从内容上看, 共识性的元素是风险一词与人类的航海活动相关。在早期的航海活动中, 受科学技术等众多因素的限制, 在航海过程中必有较大的危险。由此可见, 此时的风险主要是自然现象这种外在因素导致的, 是一种外在性的危险。这种风险实质上是由于人类知识有限, 掌控自然能力的低下而形成的。由于自然本身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因此, 这样的风险对于人类尽管有不确定性, 但也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 因此, 与其说是风险, 还不如说是危险更为确

切。

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发展,风险由以外部为主转向以内部为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不断拓展和深化,许多自然现象已经为人类所认识,人类应对自然风险的能力大大加强,由自然所带来的危险性开始弱化。与此相伴随,由人类自身带来的风险却在逐步增大。“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sup>③</sup>也就是说,现代社会风险是在自然和传统的决定权失去“无限效力”情形下的风险,也就是人的决定权具有了大于自然和传统决定权的情形下的风险。更直接地说,这种风险是人自身带来的风险,是主观性的风险,是反身性现代性的风险。这种由人自身带来的风险包括了人自身决策所带来的风险以及人们对风险的认知情况所带来的风险两个方面。这不仅意味着人自我掌控能力的弱化,还意味着人的决策、认知的不确定性的增加。

这是一个两难的命题。从理论上讲,人因为对自然的认识和掌控能力的增加,应该意味着人对自身的认识和掌控能力的增加,因人而成的风险应该减少。但从风险社会的理论视角看,现代社会的风险却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之后才出现的,是人的决策、认知等主观性的风险,而且这种风险促使人类社会进入了“风险社会”。

如果我们把这一两难命题与后工业和全球化联系起来思考,问题就变得清晰多了。众多的研究把全球化理解为经济的全球化,但除了经济的全球化之外,社会的信息化也是全球化过程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基本内容。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蓬勃发展于90年代的计算机网络,不仅使信息出现了即时化,而且还带来了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即社会的虚拟化。人们不仅从网络中获取信息,对网络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而且还将大部分时间活动于网络,在网络中开展以数字化为基础的虚拟活动。而虚拟作为一种“数字化的构成方式”<sup>④</sup>,作为一种数字化的存在,使现实的人获得了一种新的生存和活动方式,即虚拟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虚拟社会。这种新的生存和活动方式与现实的人的生存和活动方式相互作用,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相互作用,促使社会发展呈现出虚拟化的趋势。

社会的虚拟化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社会信息的即时化。人们获取信息不再像以前那样,是在事件发生一定时间后获知,这使有关事件的信息可以探究、证实、发酵,通过这一过程形成相应的事件感知。在信息即时化状态下,虚拟事件本身即成为信息,事件背后的因素则被遮蔽,这使人们“眼见为实”形成认知,并加以判断。人不再被现实所掌控,而是被虚拟所掌控。二是信息的爆炸。信息总量快速增长与信息来源、信息渠道的多样化一起,使人处理信息的难度增加,对信息掌控能力弱化,而这种对信息掌控能力的弱化意味着人自我掌控能力的弱化。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的虚拟化使人裂变。在传统社会的现实中,人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分化为多重主体,而在虚拟社会中人则发生了裂变,由现实的人裂变为现实人和虚拟人两大类。由虚拟社会非现实性的特征所决定,人在虚拟社会中并非一种现实的存在,而是一种虚拟的存在,这种虚拟的存在使人可以任意改变自己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从而使成为与在现实社会中完全不同的存在。这就构成了一个游离、漂浮、失控的社会个体,也构成了一个虚拟化、原子化的社会,而这样的社会由于其虚拟性,个体毫无责任可言,因此造就了一个不负责任社会,同时也对现实社会产生消极的影响。虚拟社会的不负责任,使虚拟人失去了责任,而这种无责任状态反过来影响现实社会,使现实社会的责任意识下降,从而使人的自我失控。

由此可见,在多重转型共存的背景下,中国社会既面临着传统社会的危险,也面临着现代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风险,同时还面临着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互动而带来的风险。

### 风险社会的基点——个体碎片化

既然现代社会的风险是主观性风险,是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能出现的风险,是由人的决定和认知形成的风险,那么,在多重风险结构性并存的状态下,中国社会风险的基点是什么?

回答这一问题的根本是要明确在中国社会转型中谁可能是决定性风险和认知性风险的发起者。对此,研究者们大多认同贝克关于“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说法,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政府及其他组织的责任。必须明确的是,贝克这里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是指由于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和定义关系的模糊性,在风险发生后会出现没有组织为风险负责的现象,因此,这一说法并不构成风险社会的基点。讨论风险社会的基点必须从风险社会的本性出发,也就是要从风险社会的人为性或主观性出发,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进行。而要从这方面进行讨论,就必须对做出决定和认知的中国社会的“人”进行思考。

传统中国社会的“家”作为“紧紧结合的团体”,构成了社会的核心。<sup>⑤</sup>在这种家庭本位的社会中,作为个体的人很难呈现并获得应有的发展。梁漱溟先生曾指出中国家族和家庭掩盖了个体的现象<sup>⑥</sup>,费孝通先生也曾指出我国的个体是一根一根的柴,而西方的个体则是一捆

一捆的柴<sup>⑦</sup>。因此,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作为个体的人是被遮蔽、孤立的、隐匿的人。20世纪初期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完成社会启蒙的任务,科学与民主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实现,个体仍然被遮蔽;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制”在根本上也是一种非个体呈现的制度安排,个体仍然沿袭了传统社会中个体的特性。可以说,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社会中作为个体的人是一种未经启蒙的、整体的人,或者说相对现代社会而言,是不能满足现代社会需要,与现代社会不一致的不成熟的人。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社会的市场化进程,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开启了中国社会个体从遮蔽到呈现、从整体性到个体性、从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

关于碎片化,人们更多谈论的是社会的碎片化,即社会的原子化现象。但在笔者看来,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不仅存在着由单位制解体带来的社会的原子化或碎片化现象,同时也存在着个体的碎片化现象,即个体由传统社会中的未分化的整体碎片化为零散体。

个体碎片化的第一个表现是个体的社会疏离。疏离性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这首先源自于工业化,一方面,大机器生产使居住地与生产地分离,打碎了依托于传统社会的地缘关系,弱化了传统社会的血缘关系和业缘关系,从而使建立在地缘、血缘、业缘一体化基础上的“亲密共同体”的社会关系被破坏,导致了社会的原子化;另一方面,传统的观点认为,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分工带来的是社会的“有机性”,是一种更为有机性的社会关系,但通过更深入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当大机器把人固定在机器上时,人成为机器的一部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社会团结越来越依赖于机器所提供的团结方式,即大机器及其所提供岗位的联结方式成为个体间基本的联结方式。因此,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分工强化的不是个体间联系的有机性,而是个体间联系的机械性,是一种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业缘关系。由此,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所构建的是一种疏离性的社会关系。而社会的信息化则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的疏离化。这主要在于信息化使全球一体化的同时,也使个体间的联系间接化、虚拟化。而在中国的社会转型中,这种疏离化的过程不仅受上述因素影响,而且还表现为个体主动的社会疏离。在利益驱动下,大量个体走出熟悉的社会圈子,使个体既疏离于原有的社会关系,同时又疏离于新的社会关系,形成个体的漂浮、游离状态。

疏离性和个体的社会疏离导致了个体原有社会支持体系的解体,从而使个体的社会支持弱化。社会转型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个体责任增大的过程。在家庭本位下,家庭所具有的全面功能为个体提供了全面持久的社会支持,如教育、养老等;在单位本位下,尽管传统的家庭支持功能在弱化,但其仍然在继续发挥个体支持的功能,同时,单位作为主要的支持系统为个体提供了正式的社会支持,这使正式的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的社会支持得到了统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的社会支持功能进一步弱化,单位制走向解体,其社会支持功能趋于瓦解。个体主动疏离社会则使个体远离社会支持体系,游离于社会支持体系之外。这使以往由家庭和单位承担的一些功能转向个体,从而加大了个体的社会责任,但与此同时个体承担责任所需要的支持体系却没有建立起来,出现了社会责任个体化的现象。这就进一步强化了个体的社会疏离,使个体的社会预期弱化,对社会的信任、依赖及关心减弱,少数人甚至出现反社会情绪,趋向自我中心。

个体碎片化的第二个表现是个体的自我疏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个体自我认同破碎;二是个体自我协调机制的破碎。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无论采取何种方式,人都需要与社会联结起来,一方面使个体进入社会,另一方面使社会得以实现。而在社会关系疏离化的情形下,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区以及个体与组织之间的联结管道减少,联结弱化,这必然导致个体产生无根的感觉,从而使个体的社会角色意识缺失。“我是谁”这一基本问题呈现在处于转型社会中的个体面前。从目前引起社会广为关注的一些社会现象看,如“富二代”、“官二代”、“农二代”等现象,特别是“农二代”现象具有非常的典型性,其似农非农、亦城非城的状况使他们找不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不能明晰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从而导致个体不能很好地回答“我是谁”这一问题。“对没有社会功能和身份的个人来说,社会是非理性、无法预测和不成形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身份的缺失会使一个人从自己的同胞社会中被抛出来,成为‘无根的’个人或弃儿,而此人是看不到社会的。他看到的仅仅是一些恶魔似的力量,它们似有似无,忽明忽暗,但从来都无法预测。他就像一个被蒙住双眼的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玩一个他不知道其规则的游戏。”<sup>⑧</sup>

在缺乏自我角色定位的情形下,个体自我协调机制也被破坏。首先,个体自我协调的标准丧失。个体协调个体自身、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社会的基本标准是个体的社会定位。个体依据其在社会中的角色,明确自我,调整自己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体社会定位缺失,这就使个体在自我协调时失去协调标准。其次,个体社会定位的缺失意味着个体在社会中不断流动,而在社会的强流动性中个体自我协调的场域也会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样,由于个体面临的场域不断变化,从而使个体的社会认识模糊化。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将难以理解社会,从而使个体逐渐远离社会,而社会也将难以理解个体,从而将个体排斥在社会之外,使个体与社会联结的途径减少,也使个体的社会功能不能有效实现,无从协调自我与社会。再次,个体自我的内在协调出现失衡。个体是一个由各种关系构成的有机整体,一般情形下处于均衡状

态,这种均衡保证了个体的秩序,使个体表现出正常的社会行为。但在上述几种情况下,个体自我的协调机制必然弱化,从而形成个体的内在张力,导致个体自我秩序的失衡。

个体碎片化的第三个表现是个体趋向片面化。个体的社会疏离和自我疏离必然导致个体的片面化。工业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人走向“单面人”的过程,而多重性的急剧的社会转型则强化了这一现象,使个体趋向片面化。这种片面化主要表现为个体在认识和处理各种关系时具有片面性。首先,个体思维方式趋向片面化。个体在简单地把社会归纳为“好或坏”的基础上,在两极思维中更多地指向“坏”的方面,甚至于只看到“坏”的方面,在个体思维中形成“阳光性因素”减少,“黑暗性因素”增多的印象,从而最终形成一种片面的社会认识。其次,个体社会批判趋向片面化。片面的社会认识必然带来片面的社会批判。这种片面的社会批判表现为指责多、肯定少,社会批判多、自我批判少,外部归因多、内部归因少等众多方面。这种片面的社会批判同时又进一步强化了片面的社会认识。再次,个体行为片面化。在“黑暗性因素”增多的片面的社会认识和社会批判情形下,个体社会安全和社会信任缺失,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保护”意识增强,这种“自我保护”意识在行为上就表现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即行为的片面化。又次,个体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之间出现紊乱。这表现为个体社会批判的现象与个体行为现象并存,即个体在批判某种社会现象的同时,却在行为上践行着这种被批判的现象。最后,个体在各类社会关系的处理上趋向片面化。人是一个关系体系,因此,正确处理各类社会关系是个体存在和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而在复杂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体在处理面临的社会关系时出现了片面化的现象。如在自我与社会关系的处理上,个体更强调自我的需要,而忽略社会的需要;在市场经济要求的自主、自立与自律关系的处理上,个体更多地强调自主与自立,而忽略自律;在权利与责任、义务关系的处理上,更强调权利,而忽略责任和义务。

### 个体风险管理的本质——社会管理

个体的碎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也就是说,个体碎片化现象的存在并不是一种永恒现象,而是我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是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体从遮蔽到呈现、从整体性到个体性、从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过程中产生的现象,是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个体可以自然而然地解决碎片化问题,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个体碎片化现象带来的社会风险。

从风险社会的视角看,由个体碎片化带来的社会风险是个体决定能力和个体风险认知能力的弱化。就个体的风险认知能力看,个体的社会疏离使个体与社会出现隔离;个体的自我疏离则使个体自我系统零碎,个体内部失序;个体的片面性则使个体整合自我与社会的能力趋弱,个体不能有效地判断自我、社会及环境,当面对非经验的问题时,个体对这些非经验问题的认知就会出现片面性,出现夸大或弱化风险的现象。同理,当个体需要做出相应的决定时,其决定能力也会弱化。

个体风险认知和决定能力的弱化,必然带来社会风险认知和决定能力的弱化。社会是个体作为主体构成的关系体系,当社会主体碎片化时,社会凝聚度不够,个体社会联结的路径较少,社会共同意见难以形成,这一方面会导致社会的风险认知能力弱化,另一方面也会使社会做出决定的能力弱化。因此,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风险在根本上是一种个体的风险。

抽象地看,由个体风险认知和决定能力弱化带来的风险是个体的风险,其根源也在于个体,但由于个体是社会的主体,社会是个体关系的有机体,因此,这种个体风险同时也是社会风险。也由此,个体风险的管理除了个体的治理外,还需要社会的治理,而且在根本上是社会的治理。只有通过社会的发展,在社会发展中促使个体从遮蔽到呈现、从整体性到个体性、从不成熟到成熟,才能真正管理好个体风险。

首先,应加强社会转型的过程管理。从过程上看,从1978年至今的中国社会转型实质上是一个国家、市场、社会分离的过程。从前30年来看,中国的社会转型主要是经济体制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社会体制建设和政治体制建设也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都没有构成这一时期社会转型的主题。2006年后,社会转型开始进入社会体制建设时期,这一时期的建设目标就是通过社会体制建设逐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要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建设则还处于未完全启动的状态。从未来的发展看,当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并得到巩固,社会体制初步形成的时候,政治体制建设才有可能得以凸显,这主要是由于政治体制建设需要有丰厚的物质基础和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应该说,中国社会转型的阶段性的内在合理性,这一转型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也取得了重大成效。但不同时期社会转型的主题不同,也成为个体碎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强化社会转型的过程管理,防止不同时期转型主题的过度化,如过度市场化或过度社会化,并适时预防这种过度化可能带来的个体的片面化,尽量使社会转型过程科学化、精细化,对预防个体碎片化,防止社会风险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要加强社会能力建设,拓展个体社会联结的路径,增进社会团结,整合个体与社会。

不可否认,个体社会关系疏离化是现代化发展中的一种必然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增强社会团结的可能,其中,拓展个体社会联结的路径应是一种可能的重要的选择。个体社会联结的路径具有多样性,既有正式的制度性的社会联结路径,也有非正式的社会性的联结路径。从目前的情况看,无论是非正式的社会性联结路径还是正式的制度性社会联结路径都不能适应我国社会及个体的发展需要。在正式的制度性社会联结路径方面,存在着社会组织缺失、功能性社区缺乏等问题。而在户籍制度的改革、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社会组织 and 功能性社区组织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个体的社会联结是通过社会组织而得以实现的。

再次,应加强个体能力建设,促进个体的转型,整合社会个体。应该说,直至今日,我们仍然沿着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宏大的、一般性的社会建设模式,个体仍然没有进入社会建设的视野。但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的社会本身是一个需要明晰主体的社会,因此,个体的明晰对我国社会的稳定、和谐以及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其中,通过社会制度建设,促进社会结构趋向稳定,促使各类社会个体能够在社会体系中明确定位;强化个体自觉,增进个体和谐;促进个体适应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的社会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最后,应加强社会正式支持体系建设,整合社会,为个体及社会发展提供相应的保障。社会转型的过程是个体社会责任增加的过程,同时也是传统社会支持体系弱化的过程,这使个体同时面临责任增加和社会支持弱化的两难境地,从而导致个体呈现出对社会的依赖与信任弱化的行为方式。面对这一问题,部分实践者寄希望于传统的非正式的社会支持体系,如家庭。但必须明确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家庭等社会非正式支持体系的社会功能处于不断弱化的状态,要使家庭承担起市场经济体制中个体的社会支持功能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应建立起由政府负责的正式的社会支持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应该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方面的内容,而且还应包括社会保障的执行制度和机制等方面的内容。

总之,转型过程中我国的社会风险主要是由个体碎片化带来的风险认知和决定的风险,这种风险是由社会原子化背景下的个体碎片化、个体社会关系疏离化、社会支持体系弱化等一系列因素导致的,因此,强化社会转型过程管理,加强社会和个体能力建设,构建社会正式支持体系,促进个体的转型,对于预防和减少由个体风险认知和决定弱化带来的风险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简介:张昱,1961年生,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志丽,1979年生,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黑龙江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 参考文献

- ①③ 乌尔里希·贝克等:《自由与资本主义:与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对话》,路国林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119页。
- ②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尹宏毅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 ④ 陈志良:《虚拟:哲学必须面对的课题》,《光明日报》2000年1月18日。
- ⑤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 ⑥ 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 ⑦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 ⑧ 彼得·F. 德鲁克:《德鲁克文集》第3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责任编辑:fang

【大 中 小】

现有 0 人对本文发表评论

[查看所有评论](#) [发表评论>>>](#)

相关文章：  
无相关信息

[首页](#) > [社会学研究](#) > [推荐阅读](#) > [推荐阅读列表](#) >

Copyright © 2007-2012 Sociology Perspective, All Rights Reserved  
【社会学视野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办  
版权所有 转载请注明出处 联系我们 sociology@163.com  
京ICP备09028113号